■干部培训

十六大以来的干部教育培训

□袁金辉

十六大以来，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作出了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部署，干部教育培训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干部。十六大召开后不久，中央就对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部署，并分别举办了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新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研讨班,随后又连续举办了10期共1500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题研讨班，并同时依托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对全国54万多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轮训。五年来，中央还先后举办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江泽民文选》等5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干部。同时，对全国5474名县委书记、县长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专题培训；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金融机构主要领导人员进行了“增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专题培训。

二、干部教育培训服务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作用不断增强。十六大以来，着眼于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中组部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按照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国防等方面的重大部署和要求，举办了300余期专题研究班，有效保障了中央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比如，为提高政府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挑战的能力，在全国党政干部中开展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培训；为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与中宣部、司法部联合在全国公务员中开展了学法用法活动和依法行政培训；为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在全国党政干部中启动开展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培训；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组织实施了东西部干部对口培训；为提高政府专业化行政管理水平，有关部门大力积极推进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从2001年至今，已有数万名公务员参加了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学习。同时，各地各部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整体推进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培训。比如，各地普遍组织开展了领导干部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大力开展了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培训。

三、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初步建立。主要包括：一是建立了干部教育培训的法规体系，基本实现了依法培训，依法管理。2005年4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专章对公务员培训进行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公务员培训纳入了法制的轨道。2006年1月，中央颁布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该条例系统总结了我们党在干部教育培训方面的经验，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党内法规，是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基本规章。2006年底，中央还颁布了《2006年—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标志着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建立健全了干部教育培训管理体系，基本形成了组织人事部门统一规划、综合指导，其它部门分工负责、具体实施、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现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行在党中央领导下，由中央组织部主管，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工作部门分工负责，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三是初步建立了干部教育培训的类别体系。十六大来，按照我们党逐步确立的干部分类管理原则，根据大教育、大培训的要求，整体推行了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三支队伍的培训工作。特别是以党政干部为主体的公务员队伍，形成了以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和在职培训为主要形式，以出国（出境）培训、对口培训、学历教育等为有益补充的培训新格局。

四、干部教育培训规模逐步扩大，培训质量不断提高。据初步统计,从2003年到2006年,全国参加各类脱产培训的党政干部约1900万人次、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约1100万人次、专业技术人员约3300万人次;全国80%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已达到5年内累计3个月以上脱产培训的要求，原定在五年内对全国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轮训一遍的目标完全能如期实现。同时，在各级党政干部培训中，相关培训机构大胆创新，勇于改革，培训质量不断提高。在培训内容上，一直把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作为培训的重点，并在实际教育培训中加以认真贯彻落实。在培训方法上，根据干部学习培训的特点，提高了讲授式教学的质量，加大了研究式教学的力度，大力推广案例教学、现场教学、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现代教学方法；同时，大胆借鉴现代科技运用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注重运用网络学习、电化教育、远程教育等现代手段，以及合理利用境外培训资源，为干部提供了多样化学习途径。同时，干部教育培训的教材建设、学科建设、教学管理、教学服务等设施也在近些年得到了有效的改进，特别是2006年由胡锦涛总书记作序，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第二批15种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的出版发行，使我国干部教育培训的规范化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文化视野

中医存废之争的文化哲学解析

□闵家胤

今年2月参加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回来后，读了大会发的一份文件《中医哲学：思想、原创与机遇——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预备会议暨中医哲学研讨会发言记录》，使我对中医已经面临存亡危机的形势及造成这种不正常局面的原因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还使我对前不久有人认为“中医不科学”，要求“国家取消中医”，从而引发“中医存废”的讨论有了较多了解。更重要的是，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中医存废”的讨论涉及对文化的理解，中医的命运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

时间维度中的文化 时间维度中的医学

医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讨论医学应当先讨论文化，医学的废存关系到文化的废存。这在学术界已是共识。

不过，近代中国学术界讨论文化问题，长期习惯于仅仅采用“地理平面直角坐标系”，特别是其中水平的一维——“东西维”。可是，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中讨论文化进化或文化发展，永远不可能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原因很简单——缺少时间的维度。在没有时间维度的“地理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绝对是平起平坐的，于是学者们就永远可以抬杠：“为什么我东方文化就要西化？为什么你西方文化就不东化？”具体到中国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要西化？为什么中国社会要西化？”按照这样的逻辑，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也可以反问“我们的北方文化为什么要南化？”，而南太平洋的毛利人也可以反问“我们的南方文化为什么要北化？”所以，后来有些聪明的学者终于有所醒悟，发明了“现代化”这个词儿，然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文化要现代化，中国社会要现代化”。

引入“现代化”这个概念，其实就引入了“时间”维度，这样就对了。因为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不是在三维空间中静止地存在着，而是在四维空间中沿着时间的维度进化着。关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进化的分期，国际知识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原始社会，主流生产方式是狩猎-采集，主流文化是神话-传说-巫术；中世纪社会，主流生产方式是农业-畜牧业，主流文化是宗教-手工艺；近代-现代社会，主流生产方式是工业，主流文化是科学-技术。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发展到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的阶段，主流文化是现代科学-技术文化。这种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是全球范围内的先进文化，它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继续被称为“西方文化”是不恰当的。中国从封闭的、落后的农业社会走向开放的、先进的工业社会，进而进入信息社会，就是接受这种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并且要代表这种“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有时间维度的社会-文化进化框架中，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以及未来的发展，就会看得很清楚了，并且能够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

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曾经历过原始社会中的巫医和尝百草的阶段，也曾有过医疗机构附属于宗教组织并用草药来治病的阶段。以西医为例，英语中的“药物”一词“drug”源于法语，本义为“干燥的草木”，又特指有麻醉作用的植物——毒品。中世纪的欧洲医学为“寺院医学”，由僧侣掌握。采用三家的医学理论：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机体“整体论观点”和“四体液病理学说”；古罗马加伦的“目的论”和“体液学说”；以及阿拉伯阿维森纳《医典》和分辨48种脉搏的切脉方法。药房采用“加伦制剂”，以草药为主制作丸剂、散剂、硬膏剂、浸剂、煎剂、酊剂、洗剂等。欧洲人当时也搞炼金术寻长生不老药。中世纪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为25岁，闹黑死病（鼠疫）的年代下降到17岁，1/3的新生儿不能存活。从平均年龄看，中世纪欧洲跟中国两边的医学水平是差不多的。那时候的西医，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常常采用“放血疗法”和“灌肠疗法” 活活把人治死，可见其水平甚至要低于同时代中国的中医。

欧洲的西医后来这三百年突飞猛进的发展，是随着欧洲各国的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发生的。新教和天主教先后允许解剖尸体，便为西医的发展打开了一扇大门，使得对人体及其病理的研究能逐步深入到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层次。除解剖学外，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发达为医学的发达奠定了基础，并且统一的医学发展成了分科的医学。工业技术和制造能力不断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西医才逐步拥有了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内窥镜、显微镜、化验、X光透视、X光造影、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成像、B超成像、核磁共振成像、活检等越来越先进的诊断手段，以及打针、麻醉、开刀、输氧、输血、输液、假肢、器官移植、人造器官植入、心血管支架、人工辅助生殖、生物遗传工程等越来越先进的治疗技术。分析化学、合成化学和化学工业的发达，西医制造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药物：牛痘疫苗、阿司匹林、磺胺、维生素、青霉素、链霉素及其它多种抗生素。这些药物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制伏了一系列传染病，使人类的平均寿命从十六世纪的27.5岁，延长到二十世纪末的77.5岁。

所以，我们叫惯了的“西医”，实际上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医学，是作为现代科技文化的一部分的医学，是全人类的主流医学，其恰当的称谓应当是“现代医学”。相比之下，中国在中世纪比欧洲更发达的“中医”，由于社会长期封闭、保守、停滞，没有进化出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基本上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其恰当的称谓应当是“传统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在1992年出版时，医学就是分成两卷——《现代医学卷》和《中国传统医学卷》。那就是最恰当的分类和最科学的命名。

走出“中医现代化悖论”

国内学术界有人提出，中医不走改革和现代化的道路不行，可是中医改革和现代化就等于中医现代科学化，中医现代科学化就等于中医西医化，中医西医化就等于中医自己走向灭亡，并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这个悖论一方面反映出我们前面讲的人类文化和医学发展的总趋势：从属于当代主流文化——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现代医学“西医”是主流医学，从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传统医学“中医”是非主流医学。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二者这种总的态势不可能改变，也不可能逆转。所以，中医未来要在中国和全球大发展是不大可能的。然而，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医注定要灭亡，那也过于仓促和草率。

另一方面，这个悖论也告诉我们，中医如果死守传统并拒绝改革和现代化，或还按过去半个世纪走的老路往下走，其继续缩减和消亡是必然的，而且缩减和消亡的速度会加快。相反，如果中医不死守传统，而是积极进行改革，在保持中医自身特点的前提条件下走现代化-科学化的创新之路，它就一定不但能继续维持下去，而且还可能扭转颓势向上发展，在中国和世界医学界争得更大的地盘，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医也有某些优势，中医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所以，中医走出“中医现代化悖论”的关键就是前面我讲过的那句话：“在保持中医自身特点的前提条件下走现代化-科学化的创新之路”。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文化自觉

全国党校系统“和谐社会与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2007年8月6日至9日在西宁举行，会议由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和青海省委党校共同举办。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和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曲青山到会。来自全国各省、市党校的近百名会议参加者围绕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讨论。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构建和谐文化战略任务的提出和实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文化自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战略中明确了文化建设的使命和任务。与会者普遍赞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根本。《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的概括指明了和谐文化的价值导向，对建设和谐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要搞“清一色”，在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发展趋势中，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基础，坚持先进文化导向，才能充分发挥和谐文化应有的社会文化整合功能。

与会者认为，目前我们所倡导的和谐文化不是传统和谐思想的简单重复。在当下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中，如何从中华传统经典中汲取精华，启迪我们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来促进社会和谐，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借助于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解读中国，或者是沿用阶级性的话语来解读古典，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民族本土意义的失语，这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是不利的。因为它失去了民族文化的深度认知，因而也不能得到民族文化的深度支持，更不能在民族生活习性和文化心理上得到百姓的认可，唤起人们共建的自觉性。应当采取的态度是，既要大力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又要注重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在实践中处理好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文化积累与文化创新的关系。与会者将这种态度概括为“立足本土，兼收并蓄，整合转化，培植创新”，即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新的飞跃与升华。

（李媛媛）

中国政法大学
在职博士课程班招生
专业方向：法学、政治学
招生对象：1、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
2、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3、工作有重大成就的在职人员
上课地点：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联系电话：010—62521022
62521335 赵老师
网 址：http://www.fadayx.com
（法大研修网）
◆公共管理硕士◆法学硕士 简章备索

■文化研究

地域文化：重价值蕴涵 忌惟利是图

□张宏明

文化是人创造的，地域文化就是人为了适应具体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创造的，它是人的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协调的统一体，也是人与自然及社会协调的统一体。一个具体的地域文化，通常历经成百上千年历史的磨砺，其存在在当地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一个具体的地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人，在语言、行为方式、思想、以及价值观等等方面，都受此地域文化的影响，从而带有某些共性。但这些共性并不影响个人之间因个人理解的不同而保留的分歧。因此，地域文化内部同样也存在多元的倾向，这有助于防止地域文化的僵化。由于地域文化作为国家的一个部分，还会受到国家政策的调控和影响。实际上，地域文化整体上又处在国家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之中，与其他的地域文化相比，又俨然自成一体。这种多层次的文化格局，既避免地域文化凝固为僵硬的教条，保持变迁的活力，又避免地域文化散落成零星的碎片，保持完整的形象。总之，地域文化是一种极具弹性的文化资源。

在区域发展的具体规划中，首先要承认地域文化具有的合理性，不能把风俗、习惯、传统的价值观、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活动一概视为现代事物的反面，随意地批判或抛弃。这也就是说，不能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简单地视为传统和现代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实际上，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划分，与韦伯的观点相去不远。如果坚持现代性对中西所有文化都具有超越性，坚持文化发展的多种途径，被归于传统之列的中国文化就不必然与现代性对立，因为原本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实际上是中西之间被夸大的对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不需以西方的现代化为标准，只应该将其作为参照。区域发展的规划就应该以现有的地域文化为基础，力求创新，由此保证文化的多样性和连续性。这样的区域发展才有稳固的根基。中国目前的区域发展中就有一些是以地域文化为基础来操作的。

与当年乡镇企业的发展被称为“异军突起”一样，以“世界文化遗产”模式进行的区域发展也同样有“异军突起”的味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虽然自1987年就有中国的文化景点开始进入这一名单，但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周庄古镇相继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才在中国掀起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潮。究其原因，乃是这些原本鲜为人知的地方，一经打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之后，立即成为新兴的旅游热点，创造轰动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经济效益大幅增长的背后，看到的是地域文化所起的基础作用。纯粹以经济发展的指标来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以上三个地方都没有处在经济发展的前列，而且以资源、能源、人力资本和交通等因素看，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并不看好。但依靠当地的文化景观、生活方式这样一些原本被忽略的文化因素，三个地方的经济都实现了某种跨越式的发展。这个意义上起到了“异军突起”的作用。其轰动的经济示范效应，也带动了更多的跟进者。以中国地域辽阔，文化多样性丰富的现状而言，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情并不为过。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正确看待“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这不仅涉及到保护与开发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整个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

无庸置疑，当前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潮中，以文化遗产为手段，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动机是绝对存在的。这样的动机使各地的地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都被视为前现代的产物，目前只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被包装起来作为“现代人”的猎奇场所。因此，在保护和开发的实际操作中，开发的势头总是压过保护的呼声；古城或古镇原本专供居住的住宅，逐步转为商铺；新城的建设风格，与古城相去甚远。事实上，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本身无可厚非，但必须有前提。前提就是，文化遗产本身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必须自始至终放在第一位。在此前提下，经济利益的获取可以有一定的合理空间。

把文化遗产及其价值观念放在第一位，是对现代性具有超越性、文化具有相对性两个观念的坚持。文化的发展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路径，西方文化对现代性并不享有专有权。上述三个古城和古镇中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与西方现代文化中人与自然对立的关系不同。人与自然这两种不同的关系，可以导向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依靠科技、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几百年来建立了一整套独立的人类生存系统，钢筋水泥的摩天大厦曾作为其现代化的标志。但要维持这种系统的正常运转，很难直接借助自然界的供给，必须依赖复杂的生产程序来供给，这就造成很高的维护成本。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难以在全国普遍地仿效这种与自然相脱离的人类生存系统。因此，各地区根据自身的地域文化，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逐步发展出适合自身情况的现代生活方式，就是对地域文化的发展，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的一种探索。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依靠各区域的协调发展，总体的文化建设也依靠各地域文化的协调发展。当前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形成的区域发展模式中，有喜有忧。喜的是原本作为落后表现的地域文化现在能够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受到重视，忧的是地域文化的发展建设中依然偏重经济效益。如果只以文化建设作为手段，经济利益仍然是目的的话，文化建设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必须把地域文化的发展提高到探索中国文化走向的高度，体察地域文化中蕴涵的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加以文化创新，为众说纷纭的现代性作出中国特色的解释。